

## 釋字第 763 號解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蔡明誠大法官 提出

張瓊文大法官加入二、三、部分

土地之一般徵收完成後，土地法第 219 條規定於一定條件下，賦予原土地所有權人對被徵收土地之收回請求權，本解釋認其係憲法第 15 條財產權保障之延伸，應受憲法財產權之保障，確有其憲法解釋之意義及價值。惟為確保收回權之實現，是否即課予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定期通知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後續使用情形之義務，及若未通知所衍生之法律效果如何，因涉及收回權之定性及通知效力等問題，均值得再推敲。爰提出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如下：

### 一、收回權之定性

關於收回權之法律性質，屬私法性質之法定買回權或公法性質之請求權？學說及實務見解不一。本解釋將土地徵收完成後，被徵收土地如未依照核准計畫之目的或期限實行使用，原土地所有權人之收回權，定性為公法請求權，惟此與過去部分學說參考日本私法請求權說之見解<sup>1</sup>，及過去實務上

---

<sup>1</sup> 例如史尚寬，土地法原論，台北：正中書局，民國 64 年 2 月臺五版，頁 592-593，認收回權依我土地法之規定應為私權，為原所有人不管事業人之意思，而得回復其原所有權之權利，與徵收權雖相似，然徵收權為公生活所認之權利為公權，收回權專為原所有人之私生活所認之權利，非對於國家之權利，乃對於事業人之權利，故為私權。其權利如發生爭執，應依民事訴訟主張之。收回權為法定買回權，為不管事業人之意思如何，得以一定之對價而收回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之權利，非為原始的取得，乃為權利之移轉，此點與民法上之買回，並無不同，只不過民法上之買回權是基於當事人之契約，而此則基於法律之規定。且因基於法律之規定，並對第三人亦有效力，具有物權之性質，故稱為法定物權的買回權。

認為其係法定買回權或再取得權<sup>2</sup>，有所不同。<sup>3</sup>但與國內近來土地法相關文獻通說相似，傾向於公法性質之請求權<sup>4</sup>，因土地徵收係國家基於公共事業之需要而剝奪人民財產權之一種強制程序，具有強烈之公法色彩，因需用土地人未依規定使用被徵收土地，而賦予原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收回權，屬徵收制度之一環，從而收回權在性質上屬公法上之請求權。<sup>5</sup>但究竟係認被徵收土地之收回權屬解除徵收之原狀回復請求權<sup>6</sup>或附停止解除之請求權，或為廢止徵收處分請求權<sup>7</sup>，或為徵收解除之請求權<sup>8</sup>，未來宜參考外國立法例再深入探究

---

<sup>2</sup> 例如最高法院 73 年度台上字第 2172 號民事判決，土地法第 219 條所規定收回權之性質，非為解除徵收原因之原狀回復請求權，係屬收回之再取得權，惟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仍需經移轉登記為原土地所有權人（包括其繼承人在內）名義所有，始能取得收回，尚非一有上開收回土地權利之主張，即足使原被徵收之土地當然回復為原所有權人所有。

<sup>3</sup> 若認徵收收回權屬公法上請求權，除須符合解除徵收之要件，原土地所有權人尚須踐行一定程序後，始得回復其土地所有權；若認徵收收回權屬私法上之權利，亦即屬於私法買回權之一種，僅須收回之法定要件成就，原土地所有權人即得買回其土地。參照陳明燦，土地徵收導論，2013 年 9 月，頁 206。

<sup>4</sup> 所謂公法上請求權，包括人民依法規或一般行政法原則，可以請求行政機關對其為有利給付之特定行為之主觀公權利，例如特定具有授意性質之處分行為、及金錢財物給付之行為，例如依大法官釋字第 474 號解釋之保險金請求權。參照李惠宗，行政法要義，台北：元照，2010 年 9 月五版，頁 373。

<sup>5</sup> 參照李建良，於翁岳生編，行政法（下），第 21 章損失補償，台北：元照出版，2006 年 10 月 3 版，頁 701。

<sup>6</sup> 例如溫豐文，土地法，台中：作者發行，2013 年 3 月修訂版，頁 569。

<sup>7</sup> 例如葉百修，土地徵收法，台北：作者發行，民國 105 年 6 月初版，頁 336-337；李建良，同註 5 前揭書，頁 702。

<sup>8</sup> 例如楊松齡，實用土地法精義，台北：五南，2012 年 3 月最新版，

之。實務上亦有採公法請求權之見解，例如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863 號民事判決，認被徵收土地之原所有權人有關收回權之規定，與私法上之再取得權無涉，該被徵收土地之原所有權人自應請求原徵收機關廢止原徵收處分，使原處分向將來失其效力，始得收回，故屬公法上之請求，而非屬私法上之爭執，普通法院對之無審判權。以上見解，固有其本。惟若僅單純從救濟管道係向普通法院或向行政法院請求救濟之形式上判斷收回權性質，其係屬私法性質或公法性質之請求權，似有論證上過於簡略之嫌。質言之，宜再加上實體法上權利之定性及實質內容一併探討，不宜單就收回權之程序上救濟管道而加以論斷，亦即宜就具體條文規定內容，與民法上買回權及外國立法例學說解釋等整體比較觀察，較能得其正解。茲暫以本號解釋所採公法請求權說作為論述出發點，特別是探究徵收後之收回權消滅時效<sup>9</sup>及相關權利與義務之法律關係時，是否應與一般公法請求權衍生相關問題採取相似處理方式，亦均值得進一步探究。

## 二、收回權係由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財產權所直接發生之權利

---

頁 596；鍾麗娜，土地法，台北：文笙書局，民國 101 年 7 月修訂五版，頁 597。另贊同徵收解除請求權說者，例如陳明燦，土地徵收導論，頁 206。該書認為我國土地徵收條例第 9 條所定徵收收回權之運作程序與德國相仿，原土地所有權人須於一定期間內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收回，經核准後始得發回土地，亦即係認我國有關徵收收回權之立法，係採徵收解除請求權說。

<sup>9</sup> 既然取回權是一種請求權，便應有消滅時效以保障法律秩序之安定，此在私法及公法上都應有此制度。參照陳新民，憲法財產權保障的陰暗角落——論徵收的買回權問題，載於法治國家原則之檢驗，台北：元照，2007 年 7 月初版，頁 271。

本院釋字第 534 號解釋，雖曾認為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私有土地經徵收後，自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 1 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 1 年之次日起 5 年內，向該管機關聲請照徵收價額收回其土地，原係防止徵收機關為不必要之徵收，或遷延興辦公共事業，特為原土地所有權人保留收回權。而本解釋認為此項收回權，係憲法財產權保障之延伸，乃原土地所有權人基於土地徵收關係所衍生之公法上請求權，應受憲法財產權之保障。進一步承認收回權係屬憲法財產權直接發生之權利，值得重視。有關原土地所有權人就被徵收土地之收回權，是否為憲法上直接之回復徵收請求權 (Verfassungsunmittelbarer Anspruch auf Rückenteignung) 或再取得權 (Rückerwebsrecht)，抑或僅是各相關法律所生之請求權？從比較法觀察，於 1974 年前，德國因聯邦或各邦相關法律並未明定原土地所有人享有被徵收土地之收回權（或稱買回權或再取得權等），以致於該國聯邦行政法院當時判決否認此一權利，於 1974 年聯邦憲法法院判決<sup>10</sup>認為基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1 段有關所有權（財產權）存續保障（Bestandsgarantie）規定<sup>11</sup>，得直接衍生回復徵收權（或再

---

<sup>10</sup> 參照 BverfGE 38, 175, 181/184f.-Rückenteignung(回復徵收)（或稱再取得權；"Rückerwebsrecht"）。

<sup>11</sup> 德國基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1 段規定，所有權與繼承權受到保障。(Das Eigentum und das Erbrecht werden gewährleistet.)嚴格言之，所謂" Eigentum"，原先係指對物之權利(Recht an einer Sache)，但後來逐漸解釋為具有財產價值之權利。例如金錢債權、先買權、合夥股份權、著作權及產業財產權（專利權及商標權等）之法律地位等。(參照 Peter Badura, Staatsrecht, 6.Aufl., München:Beck, 2015, C84.)

取得權)<sup>12</sup>，之後聯邦建設法第 102 條及各邦有關徵收法規亦  
明定此一回復徵收權。<sup>13</sup>

本解釋所採保護收回權之模式，係我國土地相關法規先  
承認徵收土地後原土地所有權人享有收回權，之後始為釋憲  
機關所承認。不論先有各相關法律而後憲法解釋承認此項收  
回權，或以法續造而先由憲法法院承認此項權利後，再有各  
相關法律予以明文承認者，均宜認為原土地所有權人之收回  
權，係直接受到憲法第 15 條財產權之保障，並定性為憲法上  
財產基本權之一種，以強化人民財產權之憲法上保障。

### 三、徵收完成後通知義務及資訊權問題

在徵收土地完成後，是否應課予徵收主管機關通知後續  
土地使用情形之義務。<sup>14</sup>本解釋認為確保收回權之實現，國  
家於徵收後仍負有一定之程序保障義務。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未規定應使人民定期知悉土地被徵收後之使用情形，致人  
民無從及時獲知充分資訊，俾判斷是否行使其收回權，不符

---

<sup>12</sup> 參照 Papier in: Mauz/Dürig, Grundgesetz-Kommentar-beck-online, 2017, GG Art.14 Rdnr. 591; Petz, in: Spannowsky/Uechtritz, BeckOK BauGB, 40.Edition, Stand:01.01.2018, BauGB §102 Rdnr.1.1.; Groß, in: Ernst/Zinkahn/Bielenberg/Krautzberger, Baugesetzbuch, 2017-beck-online, BauGB §102 Rdnr.5f.; Battis, in: Battis/Krautzberger/Löhr, Baugesetz, 2016-beck-online, §102 Rdnr. 1.

<sup>13</sup> 例如 §16 Bayerisches Gesetz über die Entschädigungspflichtige Enteignung(BayEG); §42 Baden-Württemberg, Landesenteignungsgesetz; §42 Thüringer Enteignungsgesetz.

<sup>14</sup> 有認為人民只有 20 年的期待期，且原財產權人因為該土地被徵收後，所有權已經轉移，已無從擁有所有權人得以掌控其財產權狀況的能力。因此，有必要考慮規定使用人有告知義務，當徵收土地已不必為徵收所需時，即負有告知原財產權人之法定義務，俾使期能行使取回權利。參照陳新民，同註 9 前揭文，頁 285-286。

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於此範圍內，有違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徵收完成後，如課予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通知後續土地使用情形之義務，可感受到徵收主管機關對於徵收後之負責態度，本解釋強化主管機關資訊公開義務，有其憲法價值。換言之，徵收後原土地所有權人或其繼受人資訊權之肯認或行使，係屬現代民主法治國所應重視之權利，惟若再進一步探究，其係屬各相關法律所生資訊權（例如資訊接近使用(Zugang)權或答覆詢問請求權(Auskunftsanspruch)），或係依憲法第 22 條保障其他憲法上自由或權利所生之資訊權，或係本解釋所認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仍值得再進一步探討。

本院解釋曾從美國憲法增修第 5 條及第 14 條所定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陸續發展出正當行政程序等正當程序原則。但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不斷延伸之結果，此是否符合美國法上正當程序之原意，或需要另再找尋其憲法依據，不無疑義。此外，系爭規定是否構成規範不足禁止(Untermaßverbot)等問題。本解釋未深論完成徵收並按規定補償後，為何須要求再課予主管機關應自徵收完成時起一定期限內，定期通知被徵收土地後續使用情形之義務，而僅引正當行政程序原則作為論據，其論證實仍待補強。

對於請求政府公開之資訊權，包括答覆詢問請求權等，是否為憲法所直接保障之基本權利（即所謂“Der grundrechtsunmittelbare Auskunftsanspruch”），目前國內討論尚少。至於是否承認一般意義之資訊權，尚待未來有更多學說及實務上探討。如以德國法觀察，其是否屬德國基本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段有關新聞自由及媒體自由之憲法上直接保障

之基本權，長期以來引起不少討論，在各相關法律規定雖有早已承認答覆詢問請求權之規定，在若干特別法領域，例如媒體法，於一定範圍內，得主張該請求權。<sup>15</sup>基於政府資訊之公開透明要求，則傾向於肯認資訊權屬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之其他憲法上自由或權利，擬建構新型之資訊基本權，使人民得以促請政府資訊之公開透明並有接近使用 (Zugang) 之機會，而非單從憲法第 15 條保障之財產權導出該資訊基本權，以期符合資訊時代數位科技快速進步之社會要求。

#### 四、未遵守通知義務之法律效果

通知義務如不予遵守，究竟發生何種法律效果？亦有再推敲之餘地。本解釋認於解釋公布之日，原土地所有權人之收回權時效尚未完成者，時效停止進行；於主管機關主動依本解釋意旨通知或公告後，未完成之時效繼續進行。按時效發生不能繼續進行的事由，除時效中斷<sup>16</sup>外，尚有時效不完成<sup>17</sup>，後者亦有稱為時效停止<sup>18</sup>。所謂消滅時效不完成者，於

---

<sup>15</sup>參照 Christian von Ceolin, Auskunftsansprüche der Medien gegenüber Bundesbehörden, in: Geis/Winkler/Bickenbach(Hrsg.), Von der Kultur der Verfassung, Festschrift für Friedhelm Hufen zum 70. Geburtstag, München: Beck, 2015, S.429.

<sup>16</sup>消滅時效中斷的目的在排除時效進行中所生對權利人的不利益，使已經過的時效期間歸於無效，重新起算。參照施啟揚，民法總則，台北：作者發行，2011 年 10 月 8 版 3 刷，頁 400-401。

<sup>17</sup>時效不完成，對於已經過的期間仍然有效，時效僅於障礙事由終止後的一段期間內不完成。此項期間在性質上並非原時效期間之再進行，而係將時效期間酌予延長適當期間，並於此項期間經過後時效始告完成。參照施啟揚，前揭書，頁 409。

<sup>18</sup>時效的停止在立法例上有廣義與狹義兩種，廣義的停止乃時效進行中遇有一定障礙事由時均得停止進行；狹義的停止則僅在時效將完成時遇有一定障礙事由時，始予停止。後一種情形稱為消滅時效的不完成，我國民法採此種制度。民法上消滅時效不完成的事由，有

時效期間終止之際，有難於行使權利之事由，而使時效暫未完成，乃為保護權利人之利益而設。<sup>19</sup>例如民法第 139 條規定，時效之期間終止時，因天災或其他不可避之事變，致不能中斷其時效者，自其妨礙事由消滅時起，一個月內，其時效未完成。依本院釋字第 474 號解釋之意旨，民法有關時效未完成之規定，亦應類推適用於公法上請求權<sup>20</sup>

從比較法觀察，德國民法第 206 條及第 209 條亦有類似規定，債權人於時效期滿前 6 個月，因不可抗力致無法進行法律追訴之期間，時效未完成(Hemmung der Verjährung)。時效未完成之期間，不算入時效期間。德國建設法(Baugesetz)第 102 條第 2 項第 2 段有關回復徵收權之規定，明定準用前述民法第 206 條規定。<sup>21</sup>另德國各邦有關回復徵收權規定，亦有明定準用民法第 206 條及第 209 條因不可抗力事由發生消滅時效未完成及其效力之規定<sup>22</sup>。另其時效起算點，通常以

---

1.天災或其他不可避免的事變，2.遺產繼承人或管理人未定，3.法定代理人的欠缺，4.法定代理關係的存續，5.婚姻關係的存續。參照施啟揚，同註 15 前揭書，頁 404-408。

<sup>19</sup> 參照李惠宗，同註 4 前揭書，頁 378。

<sup>20</sup> 本院釋字第 474 號解釋，認時效中斷及未完成，於相關法律未有規定前，亦應類推適用民法之規定。

<sup>21</sup> 德國建設法第 102 條第 2 項第 1 段及第 2 段規定，回復徵收之申請，應於該請求權發生起二年內向主管徵收機關提出。民法第 206 條準用之。(Der Antrag auf Rückenteignung ist binnen zwei Jahren seit Entstehung des Anspruchs bei der zuständigen Enteignungsbehörde einzureichen. § 206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s gilt entsprechend.)

<sup>22</sup> 例如德國巴伐利亞邦補償義務之徵收法 (Bayerisches Gesetz über die entschädigungspflichtige Enteignung; BayEG)(BayRS III S. 601)第 16 條第 3 項規定，回復徵收之申請，最遲於使用期間屆滿後二年向徵收機關提出。民法第 206 條及第 209 條準用之。(Der Antrag auf Rückenteignung ist spätestens zwei Jahre nach Ablauf der



請求權成立時起算，但有特別增列以知悉為要件<sup>23</sup>。綜合觀察德國聯邦及各邦有關回復徵收權相關規定，立法設計不盡相同。

另請求權消滅時效之起算點，德國民法第 199 條規定，與我國民法第 128 條規定係以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為原則，兩者有所不同，前者係採取請求權成立與知悉或重大過失而不知為原則，作為請求權消滅時效之起算點，故值得留意。亦未見德國民法總則有關消滅時效明定以通知作為時效不完成之事由。又前開德國立法例係準用民法有關規定，以不可抗力事由構成時效不完成，但未如日本土地收用法規定通知得使買受權（買回權）提前消滅，即所謂失權(Verwirkung)。

有關通知後之請求權時效問題，從比較法觀察，日本土

---

Verwendungsfrist bei der Enteignungsbehörde einzureichen. §§ 206 und 209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s gelten entsprechend.) 例如下薩克森邦徵收法(Niedersächsisches Enteignungsgesetz(NEG))第 44 條第 2 項規定，回復徵收之申請，於請求權成立後二年內向徵收機關提出，並有準用民法請求權消滅時效不完成之類似規定。(Der Antrag auf Rückenteignung ist binnen zwei Jahren nach Entstehung des Anspruchs bei der Enteignungsbehörde zu stellen.)例如北萊茵西發利亞徵收及補償法(Gesetz über Enteignung und Entschädigung für das Land Nordrhein-Westfalen)第 42 條第 3 項規定，亦有準用民法請求權消滅時效不完成之類似規定。 (§ 42 EEG NW)。在我國民法並未有類似規定，未來可探討採納類似規定之可行性。

<sup>23</sup> 例如德國布蘭登堡邦 1992 年 10 月 19 日徵收法(Enteignungsgesetz des Landes Brandenburg (EntGBbg))第 42 條第 3 項第 1 段規定，回復徵收之申請，於請求權成立後二年內向徵收機關提出；於徵收目的放棄時，自原所有權人之知悉時起算該期間。(Der Antrag auf Rückenteignung ist binnen zwei Jahren seit Entstehung des Anspruchs bei der Enteignungsbehörde einzureichen; bei Aufgabe des Enteignungszwecks beginnt die Frist mit Kenntniserlangung durch den früheren Eigentümer.)

地收用法第 106 條有關買受權行使之要件與期間及第 107 規定有關買受權消滅之規定，亦值得比較探討。該法第 106 條規定，土地徵收程序完成後，興辦事業（需用土地人）取得其興辦事業所需用之土地所有權。因事業之廢止、變更或其他事由，致興辦事業人無需使用徵收土地之全部或一部，或自事業認定公告之日起已逾 10 年，未將徵收土地之全部供事業使用時，土地所有權人或其概括繼受人（買受權人）得於無需使用該土地之時期起 5 年內，或自事業認定公告之日起 20 年內之任一較後之時期，提供相當於徵收補償金之金額給該徵收土地之現所有權人<sup>24</sup>，而買受（買回）該土地。由於前述行使買受權之可能期間甚長，當買受權成立時，容易使徵收土地之現所有權人處於長期間不安之狀態。是同法第 107 條規定，興辦事業人（起業人）於有上述無需使用之土地或未供事業使用之土地時，應立即將其情事通知買受權人。但興辦事業人非因過失而無法確知買受權人時，應於該土地所在地之地方新聞紙，將應通知之內容為 1 個月至少 3 次之公告。買受權人自收受通知之日起或第三次公告之日起，已逾 6 個月者，不得行使買受權，亦即該買受權歸於消滅。<sup>25</sup>

---

<sup>24</sup> 日本土地收用法第 106 條第 3 項明定，如土地之價格（時價）較權利取得裁決所定權利取得時期之價格顯著高漲時，徵收土地之現所有權人得以訴訟請求增加買回時之應給付金額。參照陳明燦，土地徵收失效及收回被徵收土地爭議問題之研究，司法院行政訴訟及懲戒廳委託行政訴訟土地事件專題研究計畫案，98 年 12 月 28 日印製，頁 60。

<sup>25</sup> 參照陳立夫，前揭研究報告書，頁 59-60。相關日本土地收用法之中譯，參照葉百修譯，日本土地收用法（經社法規譯介叢書 051），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健全經社法規工作小組出版，民國 78 年，頁

前述日本土地收用法有關通知之規定，並未為我國現行收回權規定所繼受，如擬以參考或引用，須留意學理上有認為其係基於私法性質之法定買回權，且前述由興辦事業所為之通知，係縮短一般買受權之行使期間，如經通知或公告後，將可提早使買回權發生失權之消滅請求權時效效果，與本解釋將通知作為原土地所有權或其繼受人獲知資訊之手段，兩者之目的不盡相同，法律效果亦有差異。

本解釋另指出有關機關增訂通知義務時，為兼顧人民財產權之保障及法律關係安定性之要求，應依通知義務是否履行，分別規定短期或長期之合理時效期間。至於該短期及長期時效期間，應如何相互配合，則屬立法裁量之範圍。綜上，為免徵收所生之權利義務關係因收回土地之結果致受變動，自不宜使收回權之行使，長久陷於不確定狀態，而應有一定存續期間之限制，始為允當。<sup>26</sup>質言之，主管機關不依法通知時，其法律效果係使請求權時效停止進行，或係前述日本法作為提早消滅買受權之效果，或仍有其他適當之因應方法，凡此均宜再進一步思考其可行性。

## 五、本解釋所指檢討呼籲之再思考

原土地所有權人或其繼受人在徵收後，被徵收土地有無如計畫之建設，外界往往難以知悉被徵收土地或興辦事業之實際進行情形。實務上使被徵收土地之原所有權人或其繼受人於徵收完成後，知悉土地實際使用狀況之方式，並不以通知(notice)為主，另有公告(public notice)或其他使其知悉方式

---

65-66。

<sup>26</sup> 參照葉百修，同註7前揭書，頁348。

得以選擇。為保護原土地所有權人或其繼受人之資訊權，此時宜於個別收回權相關法律規定中，要求主管機關、需用土地人或事業在徵收土地完成後，就符合徵收目的之土地使用或供事業使用土地之後續情形，應於一定期間公告，如未依法公告或公告內容有疑義時，原土地所有權人或其繼受人得提出詢問，主管機關、需用土地人或事業有依法答覆詢問(Auskunft)之義務。此亦可參考行政處分應記載不服行政處分之救濟方法、期間及其受理機關之作法<sup>27</sup>，要求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作成徵收處分時，除教示得提起行政爭訟救濟之外，應一併告知日後得就被徵收土地使用情形提出詢問及回收權行使要件。如此或可達到原土地權利人與徵收土地之新使用人或事業間利益之平衡。換言之，如前所述，基於憲法上資訊權之承認，及為強化主管機關資訊公開義務，課予公告義務或賦予答覆詢問請求權，或許在需用土地人與被徵收土地之人間已足以取得利益之平衡，而非單方面課予主管機關於依法定程序徵收完成後，仍負有應通知義務。

又本解釋之原因案件，關於收回權之起算，實非以土地法第 219 條規定起算，而是依都市計畫法第 83 條明定<sup>28</sup>，自核准之計畫期限屆滿次日起算<sup>29</sup>。本解釋原因案件回收權之

---

<sup>27</sup> 行政程序法第 96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者，應記載下列事項：六、表明其為行政處分之意旨及不服行政處分之救濟方法、期間及其受理機關。

<sup>28</sup> 都市計畫法第 83 條（徵收土地之使用）規定：「依本法規定徵收之土地，其使用期限，應依照其呈經核准之計畫期限辦理，不受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之限制。（第 1 項）不依照核准計畫期限使用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照原徵收價額收回其土地。（第 2 項）」

<sup>29</sup> 有關都市計畫法第 83 條所稱不受土地法第 219 條限制之關係如何，

起算點係以核准之計畫期限屆滿次日起算，並為本案確定終局判決所採認，<sup>30</sup>實際上較土地法第 219 條所規定之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 1 年之次日起 5 年內行使收回權，期間又再延長甚多。本解釋如僅著眼於土地法第 219 條所定時效規定，作為解釋對象，則有商榷之處。

況且本解釋系爭規定為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規定，原土地所有權人得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機關申請照徵收價額收回其土地，由原核准徵收機關核准後收回之。收回權行使之期間，係於徵收補償發給完竣滿 1 年之次日起 5 年內。惟依現行法律，於土地徵收條例制定生效施行（即民國 89 年 2 月 4 日）以後，應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9 條規定，<sup>31</sup>依上開規定，係以徵收公告之日起 20 年內為行使收回權之期限。本解釋將主管機關通知之法律效果連結至收回權消滅時

---

曾發生疑義。在實務上，認為都市計畫法第 83 條第 1 項僅就使用期限排除土地法第 219 條之限制，未就收回期間以及收回要件併予排除適用。是其期間之計算，依都市計畫法第 83 條第 2 項文義之當然解釋，應自核准之計畫期限屆滿次日起算。此所謂核准之計畫期限屆滿，即指至徵收計畫所載完工日止。參照最高法院 97 年 11 月份第 2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採修正甲說，認為都市計畫法第 83 條第 2 項規定之「不依照核准計畫期限使用」，應就所徵收之全部土地整體觀察之，在有明顯事實，足認需用土地人已按核准計畫使用徵收土地者，原土地所有權人不得聲請收回土地。非謂需用土地人，就欲興辦事業之工程，於該徵收計畫所載完工日尚未全部完工，原土地所有權人即可聲請收回土地。

<sup>30</sup> 參照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字第 399 號判決。

<sup>31</sup> 89 年 2 月 2 日制定公布之土地徵收條例第 61 條規定：「本條例施行前公告徵收之土地，其申請收回，仍依施行前之規定辦理。」其立法理由為，依法律不溯既往原則，本條例施行前公告徵收之土地，其申請收回，仍依施行前土地法第 219 條之規定辦理，不適用第 9 條規定，以杜紛擾。但另須留意其他特別規定，例如都市計畫法第 83 條第 1 項規定不受土地法第 219 條限制之規定，以期周延。

效之效力，於最後又指出主管機關就其他與土地徵收之相關規定（例如土地徵收條例第 9 條、第 49 條及都市計畫法第 83 條等），關於土地被徵收後之使用情形，如何定期通知或依法公告使原土地所有權人知悉，亦應依本解釋意旨一併檢討。惟土地徵收條例第 9 條規定大不同於土地法第 219 條規定，於現行法律體系下，本解釋之意旨及呼籲，如何踐行？不無商榷之餘地。本解釋如基於抽象規範審查制度，究竟期待相關機關如何檢討，亦有詳予指明之必要。質言之，基於土地法第 219 條規定之立論，如何作為 89 年 2 月 4 日以後適用之土地徵收條例第 9 條規定之檢討根據<sup>32</sup>，不甚明確，此易造成相關機關修正檢討時之疑問。因 20 年為相當長之期間，是否仍以通知作為時效未完成之事由，或通知作為縮短請求收回權之行使期間，抑係仍有其他適當規範模式，此部分雖屬於立法自由形成範圍，但在尊重其立法裁量之範圍內，如能給適當指明檢討之原則或範圍，較可期待其檢討修法時能符合本解釋之意旨及目的。

---

<sup>32</sup> 本條規定如與日本土地收用法第 106 條規定相加比較，我國規定與日本法均給予相當長之時效期間。惟卻未參考日本土地收用法第 107 條以通知或公告為令收回權提前失權之規定，亦即未配合訂定以通知或公告為縮短收回權消滅時效之相關規定，爾後值得再思考參引該規定之可能性。